



陇剧代表甘肃独特风情,成为甘肃的代表剧种,它源于古老而独特的环县道情戏。如果说环县道情艺术是“陇上奇葩”,那么陇剧正是这朵奇葩结出的硕大果实。陇剧诞生40余年来,移植和创作的剧目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其行当流派也多种多样。

陇剧是由皮影戏陇东道情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搬上舞台的新剧种。陇东道情原无脚色行当,是由皮影人的不同造型来标示行当的不同。因此,陇剧上舞台后不像其它大剧种有自己的脚色行当传统可继承,而是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经过边实践、边摸索、边研究而逐渐创立了自己剧种的脚色行当。陇剧脚色行当的来源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照、模仿陇东道情皮影人物造型与皮影表演动作,创立了大体的行当分类和特性。

二、陇剧搬上舞台后,除少量改编演出道情原有的传统剧目外,大量演出的剧目是移植其它剧种的,如萧仙戏、京剧、越剧、昆曲、川剧等。在排练这些剧目时,多参照原剧种的行当,相对应的设置陇剧的行当,并吸收、融化那些剧种行当的表演身段,充实、丰富陇剧的行当。

三、根据新创作剧目的内容、剧中人物的不同类型、身份、年龄、性格等,参照一般戏曲脚色行当的规范,设置较为适合或接近的行当来表演。如陇剧第一出戏《枫洛池》的脚色行当,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将简人同设计为生小生,杜若义设计为武生,郭飞霞、马瑶草设计为小旦,牛贵设计为官衣丑,梁翼设计为大花脸。

四、在陇剧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表现和突出陇剧这一地方剧的特色,根据陇剧音乐细腻、优雅、缠绵、抒情的特色,决定了以发展“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为主,在表演上以“三小”为中心。因此,在行当的建立上,确立了以“三小”为主兼顾其它的脚色行当体制。在“三小”行当的创建中,除了选择其他剧种(主要是越剧、川剧、京剧等)有关这些行当的表演适合陇剧需要的程式以外,着重从民间艺术、特别是陇东秧歌、社火等表演中,提炼、规范、创造出陇剧“三小”行当的表演程式,如“地游驴步”、“风摆柳步”等等。

陇原非遗



“陇上奇葩”——陇剧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陇剧的脚色行当已初具规模,目前他的主要行当有——生行:包括小生、须生、老生;旦行:包括小旦、正旦、彩旦、老旦、武旦等;净行:分大净与二净两行;丑行:分官衣丑、公子丑与小丑等,均以粉底定妆,勾画丑脸妆扮。

近些年来,随着文艺形式的多元化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多样化,陇剧和其他剧种一样,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演出市场一再萎缩,有些陇剧专业团体难以维持生存。如何在甘肃文化中重点发展陇剧并提高表演水平?针对这个问题,有专家认为,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外,还应利用节庆、广播、电视等多渠道播陇剧,陇剧团更要坚持演陇剧,争取并培养观众。剧团要走出困境,在体制上要改革,现行的板腔体唱法上也要不断改进,使陇剧艺术更加完善。总之,陇剧完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耀眼明珠。



陇剧的艺术特色

动作:陇剧表演艺术讲求真实,重视从生活出发,以细腻的手法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陇剧表演动作吸收了部分皮影的侧身造型,如侍卫警戒多用大侧身剪影姿势,特别是啼哭动作更为别致,人物左袖垂肘,右手以袖掩面,大侧身晃动腰肢,前俯后摆,抽抽而泣。舞台美术借鉴皮影镂空、彩绘、装饰手法及旦角高髻

燕尾头饰等,形成独特风格。

舞美:舞台美术方面,较有特点的有如下几点:一、旦角化装舍弃了传统的大包头造型,以皮影人的高髻燕尾为基本式样,又仿照敦煌壁画中唐代妇女的发式,加以糅合,设计出单髻、双髻、弯髻、环髻等多种独特的燕尾发髻式样,前贴鬃角,后拖伞髻,大体接近古代妇女的化妆扮相;二、服装摆脱了戏曲传统风格,重新设计了花纹式样,打破了蟒、帔、褶、舞风格。图案富变化,款式重大方,色彩尚雅洁。裙子、箭衣、开路等均以素净绣边为主,不取满身花团锦簇章法。靠、铠等则以塑型神像装饰为蓝本,大体和

秦兵马俑衣甲相类似;三、布景和道具保留了皮影砌末的风格,使用夸张的技法为剧情服务。

音乐:陇剧音乐属于板腔体式,分“伤音”和“花音”两大类,伤音曲调深沉委婉,适于抒发哀怨的情感,因此又称“苦音”或“哭音”;花音曲调活泼跳跃,善于表达喜悦的情感,故又称“欢音”。陇剧唱腔没有严格的节拍,比较自由明快,说唱性较强。弹板是陇剧音乐的主要板式之一,板头、大过门规整、四方,唱腔由多种节拍型混合组成,有特定规律,小过门的第一拍,一般都重叠在唱句的末尾一字上。弹板舒缓、流畅、优美动听,最有特色。

演唱方式:陇剧的演唱方式比较自由,曲调流畅,节奏明快,近似说唱。曲调尾首的拖腔叫做“做”,唱时称“做”,嘛嘛悠长婉转,韵味浓厚,富有地方色彩,它是构成陇剧音乐独特风格的重要成分。陇剧使用的乐器也有较大的发展,增加了琵琶、二胡、笙、板胡、扬琴、提琴和一些铜管、木管乐器,丰富了陇剧音乐的表现力。

在现代甘肃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陇剧也陷入了濒临衰亡的困境,演出团体及演出场次锐减,传承链几乎中断,处于被大剧种和时尚文化所取代的困境,如不关注与保护,势必越来越边缘化乃至面临衰滞、消失。2006年5月20日,陇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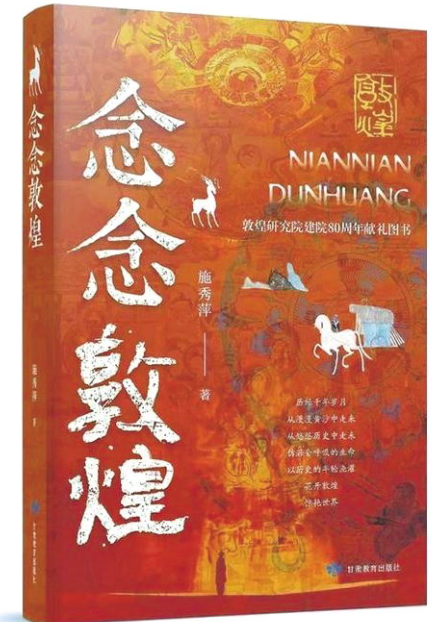
(本报编辑整理)



陇剧开山之作《枫洛池》剧照

艺术广角

一位记者笔下的“敦煌组歌”



记者施秀萍新出版的《念念敦煌》一书(甘肃教育出版社2024年9月版)递到我手上时,我决意要好好读读,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说有三“熟”:作者熟、敦煌熟、书里写的人物熟,我要看看我熟悉的作者怎么写我熟悉的敦煌和敦煌人。

《念念敦煌》有三个单元:典范与高地,千年莫高,可爱的敦煌人。在我看来,这就是这组组歌的现实篇、历史篇和精神篇。

“现实篇”翔实介绍了敦煌莫高窟遗址保护、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的现状。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强调要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五年过去了,莫高窟不负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典范与高地”的目标初步实现。说起敦煌学,大家都熟知这么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敦煌学的诞生,肇自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先提出,1930年陈寅恪有意识地多次使用,标志着敦煌学正式诞生。敦煌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敦煌文化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按理说,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事实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研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念念敦煌》以大量的采访全景式描述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经过百余年的不断探索和挖掘,呈现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高地在敦煌研究院”的现实。敦煌学研究已经向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发展,不止于文献和艺术研究,通过全方位多维度挖掘和阐释敦煌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进一步拓展了人文社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敦煌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

相比学术研究,保护肯定是更为急迫的事。莫高窟营建逾千年,自然气候、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至清末已处于极度颓废的状态。民国以来,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奔走,政府亦略有作为,但也就是停留在看护层面。《念念敦煌》用大量篇幅记录了近些年来在经费投入、政府支持、科技进步、人才培养等加持下莫高窟保护利用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说,作为世界级文化遗产留存下来的莫高窟已经转危为安,状态稳定。数字技术广泛运用,预防性保护和修复技术达到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水平,还走出国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和中国方案,其形成的兼顾开放和保护的“敦煌经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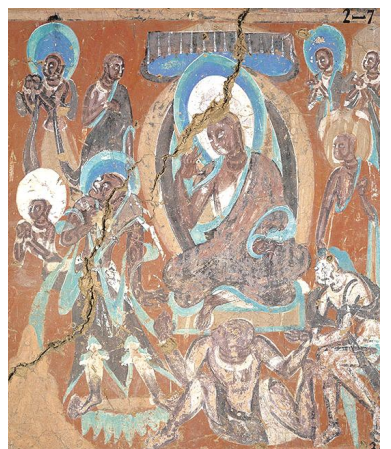
《念念敦煌》的第二个乐章,是作者2016年为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奉献的14篇系列特别报道。作者从公元366年乐僂在三危山敲响的第一声钟声写起,详细梳理了莫高窟的营建、兴盛、沉寂、劫难到再度辉煌的曲折历程。这是一个可以独立成篇的“莫高窟小史”,更是一曲令人击节、感喟、叹惋、振奋的咏叹调。作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和对

鲜活的人物采访相互印证,吸收了被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在客观的叙述中渗透着深入的思考。比如关于藏经洞文献流失,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义的谴责多,客观理性的史实还少。《念念敦煌》抽丝剥茧,详细梳理归纳了王圆箴盗取敦煌遗书的三大原因:政府不理、经济需求、信仰吻合。比较客观地还原了百年前发生的那悲剧一幕,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史实。读此章,我最大的感受是莫高窟的命运就是中华文化辉煌、式微、复兴的缩影,这也是作者带给我们的最重要思考。

《念念敦煌》的第三部分,是献给“最可爱的莫高人”的赞美诗。这些最可爱的莫高人,是几代人,是一群,又是最具个性而又鲜活的一个人。他们升华了一种精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标签。这些莫高人,有我们熟知的莫高先驱常书鸿,开拓者段文杰,“时代楷模”樊锦诗;也有我熟悉的赵声良、苏伯民,还有我曾作为编辑为其出版《敦煌飞天》的范兴儒等。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将他们的坚毅、执着、使命意识谱写出来,成为敦煌魅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作者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大国工匠李云鹤的故事,令人敬佩不已。李云鹤,一个高中未毕业的山东小伙,1956年来到敦煌,从此扎根于斯,在六七十年时间里,只干着一件事:修复伤病缠身的壁画和塑像。从最初的一窍不通,到不断尝试、摸索、创新,再到技艺炉火纯青,最终成为石窟类壁画修复界的“一代宗师”。因为在莫高,他没有因道途迢迢华丽转身成为艺术家,而是守着千年洞窟,用一生成为一名“传世匠人”。李云鹤的故事让我想起《读者》刊登过的作家周涛的一篇文章:《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而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哪怕是一段时间内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事,也就够了!

《念念敦煌》是新闻工作者献给莫高窟的一瓣心香,是一曲高扬着主旋律的“敦煌组歌”。一念,是敦煌;再念,还是敦煌。愿所有读这本书的人都能像作者一样,成为传播和弘扬敦煌文化的“敦煌人”。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编辑、董事 富康年)



须摩提女姻缘之佛陀及扈从赴斋会



九色鹿王本生(局部)

“简”述中国

写在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

《四时月令诏条》



春季禁掏鸟窝、夏季禁伐木,秋季宜修房屋、冬季禁掘土地。2000多年前,智慧的古人早就把四季环保小妙招总结好了!今天,带你认识汉代的“环境保护法”——《四时月令诏条》。

写在驿站墙上的“环境保护法”

“置”是汉代的官方驿站和邮局,设立于汉武帝时期的“悬泉置”,位于今甘肃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负责接收从长安通往西域的所有“邮件”,接待中西往来的商贸使臣。在“悬泉置”的一面破损的泥墙上,一块题记分外醒目,经考古专家拼合修复,一份2000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铺展在我们眼前。《四时月令诏条》由三个部分组成,题记开头说明了朝廷下达诏令的缘故,

都是树木生长的季节,只有到了八月“草木零落”后才能适当伐木。

“禁渔” 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反对竭泽而渔,过小的鱼苗禁止捕捞。所能捕捞鱼的标准长度,须在汉制四寸(即9.24厘米)以上。

“禁杀幼小动物” 谓禽兽六畜怀妊有胎者,尽十二月常禁……谓天蚩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诏令规定正月至十二月都不能杀害怀胎动物。对幼小动物,也要加以爱护,除了强调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道”。

“修堤” “谓修筑堤防,利其水道也,从正月利夏。”意思是,春夏之际要及时修筑水利设施,以保水道畅通、农业生产。

“兴土” 秋季“谓得大兴土功”,修筑屋室以改善房屋条件、储藏粮食……

《四时月令诏条》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件,内容涵盖了保护林木、动物、水、土等各方面内容,浓缩了春秋夏秋收冬藏的四季节律。其中“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思想,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

不过时。

古人为了环保都做了哪些努力?

除了写在墙上的“环保法”,古人为了保护环境,可谓尽心竭力。

设立专门机构、官职 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古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机构“虞”。

《尚书·尧典》记述了舜任命伯益担任“虞”的官职,朱虎、熊羆为佐之。“衡”在“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根据工作内容的不同,可以细分为“泽虞”“山虞”“林衡”“川衡”等,在我国古代的许多朝代都有设置。

“创新”环保设计 不只是外部的约束,古人还把环保理念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长信宫灯、羽纹铜凤灯、雁鱼铜灯等一盏盏汉墓出土的“高科技”环保灯,体现出我国汉代时期的环保理念和超前的环保设计。

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时,工作人员运用三维动画AR技术打造出别样绚烂的数字烟花。“五彩”焰火传达出“绿色”理念,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份对环境的爱护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本报综合)

敦煌岁时节日

大寒:岁末建福,万吉万宜



拜塔·莫高窟第103窟 盛唐

大寒,宣告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到来。但这时又是热闹的。因为正值岁末,一年中最隆重的一次团聚即将到来,赶集备年货、扫尘洁物、写春联、准备鸡鸭鱼肉各种年肴……在古代,大寒更是和瑞福关系紧密——人们忙乎和过去一年告别,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增添诸多期待。寺院结缘转经祈福是此时不能少的热门节目。敦煌文献有记载,曾经的年终结坛算是佛界盛事,要持续五天四夜之久。寺院中竖幡幡、悬佛像,僧人们诵经转唱,还有丝竹管弦乐器伴奏左右。地方节度使及官员也加入其中,持炉焚

香,虔诚礼拜。观音等众多佛教神仙也没闲着。成为来年期待的嘱托对象。敦煌文献S.4654卷《岁末结坛斋文》中记载:“今者旧年将末,新岁欲临,置净坛于中央,敷幡花于宝地者,则有我净主太保,受大悲之付嘱,以法治民;承观音之遗文,钦仰仰圣。所愿者,愿龙天八部,定社稷以恒昌;所祇者,祇释梵四王,保敦煌而永泰。千灾万障,随旧岁送出于寰围;万吉万宜,逐新年来临于玉塞。”岁末祈福,就是要送走旧岁的千灾万障,迎来新年的万吉万宜。岁暮餐馔乃我国传统习俗,含有辟

旧迎新之意。古人会在岁末举行一次集体聚会,叫做“建福”。敦煌文献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S.2894v2《社司转帖》中,“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护饼壹双,净粟壹斗。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廿二日卯时于安家酒店取齐。”既然“常年建福”,可见是常规性的岁时活动,不同时间的不同文献中有不同的建福日期,但都集中在腊月下旬,社人集会的地点均在酒店。各种各样的岁末仪式,异于平常的隆重饮食,不过是在强烈提醒我们:这是一年的终章。

(敦煌研究院供稿)